

空想社会主义者
圣西门、傅立叶、欧文
的教育思想资料

甘肃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

1979-10

空想社会主义者
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
教育思想资料

甘肃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
资料室

一九七九年十月

1

前 言

十九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它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他们的学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已开始暴露时的产物，它反映了劳动人民和早期的、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这些思想家，在资本主义制度刚刚确立，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的历史条件下，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对未来的、合理的、协调的社会即社会主义作了不少探讨和猜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空想家的学说中，不能不有许多缺点和错误。他们的唯心史观和阶级调和论，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错误态度，使他们的社会主义必然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空想。尽管如此，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仍然有着重要地位。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深刻批判了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错误，同时又批判地吸收了其中有价值的思想。

在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著作中，有许多教育方面的言论。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教育思想，是他们整个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教育学说的著名先驱者之一。今天，我们研究圣西门、

傅立叶、欧文的教育思想，对于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内核，对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的理解，有重要的意义。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教育观点，各有自己的特点。圣西门猛烈地批判了中世纪的教育，揭露了僧侣阶级进行的教育，直接使法国人变成奴隶。傅立叶在描绘未来社会的生活图景时，特别关心和谐社会的教育事业。他精心地观察儿童的年龄特征，要求发展儿童的创造性。他详尽地论述了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的教育意义，包含了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思想的萌芽。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过傅立叶的教育思想，指出：“这些观点是这方面的精华，并且包含着最天才的观测”。欧文的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质。他在英国新拉纳克进行了长期的教育试验，首次提出了从学龄前教育到学校教育，又到成人业余教育的完整体系；他第一次在世界上为工人阶级的儿童举办了幼儿园；他在实践上实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他细致地描绘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教育蓝图。所有这些，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教育家们中是无与伦比的。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我们水平所限，这份资料一定会有不少遗漏和不足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七九年十月

目 录

前言.....	
---------	--

第 一 部 分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圣西门、 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	(1)
---	-----

第 二 部 分

一、圣西门的教育思想资料.....	(24)
二、傅立叶的教育思想资料.....	(42)
三、欧 文的教育思想资料.....	(89)

第一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论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 空想社会主义

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尚未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见“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这些体系的发明家们虽然曾经看出阶级的对立，看出统治着的社会本身内部的破坏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没有看出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首创作用，没有看出无产阶级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

既然阶级对抗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这些发明家同样也还不可能发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那应该能够造成这种条件的社会科学、社会规律。

这样，社会的活动就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实现解放的历史条件就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逐步向前组织成为阶级的进程就要由按照他们臆想出来的方案组织社会的努力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全世界的

历史都归结为他们那些社会计划的宣传和实现。

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在这些计划中主要是拥护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作为这个受苦最深的阶级才存在的。

可是，不大发展的阶级斗争形势以及他们本身的生活地位，却使他们自以为是高高超出这种阶级对抗之上的人物。他们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甚至连那些处境极优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甚至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根据他们的意见，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建设最美好社会的最优良的计划。

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拒绝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细小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用实例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扩道路。

这种幻想的未来社会方案，是在无产阶级还处于很不发展状态，因而对本身所处地位还抱着一种幻想的时候产生的，是从无产阶级希望社会总改造的最初的充满予感的激动中产生的。

但是，这些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包含有批判的成份。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意识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些积极的结论，例如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发财制度，消灭雇佣劳动制，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单纯的管理生产的机关等，——所有这些原理无非都是表明消灭阶级对立的必要，但是由于这种阶

级对立在当时还刚刚开始发展，它们当时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最初的无定形的模糊表现。因此，这些原理也就还带有完全空想的性质。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500—501页）

我们已经看到，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思出新社会的轮廓，因为这些轮廓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之所以限于为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向理性求助，正是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

（摘自恩格斯：《反杜林论》，1877—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90—291页）

……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了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制定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

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

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和不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只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

.....在当时才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表现为一个被压迫的受苦的等级，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缺点；消除这些缺点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

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见的。

.....

……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

（摘自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7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07—208、210、217页）

乌托邦是一个希腊字，按照希腊文的意思，“乌”是“没有”，“托邦斯”是地方。乌托邦是一个没有的地方，是一种空想、虚构和童话。

政治上的乌托邦就是无论现在和将来都决不能实现的一种愿望，是不依靠社会力量，也不依靠阶级政治力量的成长和发展的—种愿望。

（摘自列宁：“两种乌托邦”，1919年10月，《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9页）

……空想社会主义没有阐明社会生活的法则，只是飞

翔在实际生活的上空，好高骛远，殊不知真正需要的却是与现实的牢固联系。当实际生活中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任何基础时，空想家们就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当前的目标，并且依其结果讲来更可悲的是，他们（罗柏特·欧文、路易·勃朗、傅立叶等等）期待当代有权有势的人来实现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是不难信服社会主义理想的正确性的。这个观点完全抹杀了现实的工人运动和工人群众，其实工人群众才是社会主义理想唯一天然的代表者。空想家们是不了解这一点的。他们想不依靠人民（工人）本身的帮助而用制定法律和发表宣言的办法来创造人间的幸福。他们对于工人运动并没有特别注意，甚至往往否认它的意义。因此他们的理论始终是和工人群众不相干的理论，……

（摘自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的任务》，1901年11—12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10页）

……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依靠英国和法国的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

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

（摘自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70年版序言的补充，1874年7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66页）

……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

（摘自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本初版序言，1882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47页）

……但是初期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批评资本主义社会，指斥它，咒骂它，幻想消灭它，幻想有比较好的制度出现，劝导富人，说剥削是不道德的。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不能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

（摘自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1919年3月，《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5页）

……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直还隐蔽着的性质。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

（摘自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7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26页）

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规划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它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说明了雇佣工人、购买劳动力怎样掩盖着一小撮资本家、土地占有者、厂主、矿山主等等对千百万贫困人民的奴役。它表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进程怎样使小生产逐渐受大生产的排挤，怎样创造条件，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成为可能和必然。它教导我们透过那些积习、政治手腕、奥妙的法律和诡辩的学说看出阶级斗争，看出形形色色的有产阶级同广大的贫苦人民，同领导一切贫苦人民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它说明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真正任务不是臆造种种改造社会的

计划，不是劝导资本家及其走狗改善工人的处境，不是策划阴谋，而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争取达到最终目的——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

（摘自列宁：《我们的纲领》，
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6页）

……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承认了无产阶级经济斗争具有重大意义和必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40年代就已经驳斥了否认这种斗争的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也指明了一个正确的立场，一方面根本反对夸大政治的意义，反对阴谋（布朗基主义等等），另一方面又根本反对轻视政治，或者把政治缩小为补缀现存社会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之类的东西（无政府主义，空想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教授社会主义等等）。

（摘自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
人抗议书》，1899年8—9月，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
出版社1958年版，153—154页）

社会主义者向工人说：不要结成同盟，这样做归根到底你们会得到什么呢？能提高工资吗？经济学家可以非常清楚地向你们证明：即使事情顺利，在短期内多拿到几文钱，但是以后工资要永远减少下去。熟练的核算家会向你们证明：单是你们组织和维持同盟所必需的一笔经费，

就需要经过若干年才能从提高的工资中得到补偿。而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则要告诉你们：即使不谈钱的问题，你们绝不会因为结成了同盟就不再当工人，而老板将来却照旧当他的老板。所以，不需要任何同盟，不需要任何政治，因为组织同盟不就是搞政治吗？

.....

社会主义者劝告工人不要触动旧社会，以便更好地进入他们用非凡的先见之明准备就绪的新社会去。

（摘自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5页）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别示范的意义，比如说，某个生产组合示范的意义，必然是极其有限的；只有满怀小资产阶级幻想的人，才能够梦想用慈善机关做榜样来“纠正”资本主义。在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掌握以后，在剥夺了剥夺者以后，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榜样的力量——如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多次指出过的那样——第一次有可能发挥出来。模范公社应该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落后公社的辅导者、教师和促进者。

（摘自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3—4月，《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8—239页）

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在大革命开始时还不满三十岁。这次革命，是第三等级即从事生产贸易的大多数国民对于以前享有特权的游惰等级即贵族和僧侣的胜利。但是，很快就暴露出，第三等级的胜利只是这个等级中一小部分人的胜利：这个胜利是归结于第三等级中一个社会特权阶层即富有资产阶级争得政权。并且这个资产阶级还在革命过程中就已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在一方面是由于它对当时被没收和后来被卖出的贵族和教会地产进行了投机牟利勾当，而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以承办军用品欺诈了国家。正是这些投机者在执政府时代的统治使得法国和革命濒于复灭，从而使拿破仑得以借口来举行政变。因此，在圣西门的头脑中，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之间的对立就采取了“劳动者”和“游惰者”之间的对立形式。所谓“游惰者”，不仅是指旧时特权等级中的分子，并且还包包括所有一切不参加生产贸易而靠租息为生的人们。而所谓“劳动者”，不仅是指雇庸工人，并且还包包括厂主、商人和银行家。“游惰者”已失去精神领导和政治统治的能力——这一点已是毫无疑义，并且已由革命彻底证实了的。至于无产者也没有这种能力，则圣西门认为这已由恐怖时代的经验所证明了。那末，究竟应该由谁来领导和统治呢？按照圣西门的意见，这种责任应当由科学和工业来担负，它们两者应由一种以恢复自宗教改革时起被破坏了的宗教思想统一为使命的新宗教联系，即由一种必然是神秘和等级森严的“新基督教”结合起来。可是，科学就是科学家，而工业首先就是积极的资产者、厂主、商人、银行家。诚然，这些资产者应该成为一种社会官吏，即全社会的代办，但

是他们对于工人，却还是应当保持发号施令和经济特权地位。至于银行家，那末正是他们应该担负以调节信用来调节全部社会生产的使命。——这样的见解是完全适合于那一时代的，当时在法国，大工业，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只是处在产生的过程中。但是，圣西门所特别着重指出的是如下一点：他无论何时何地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La classe la Plus nombreuse et la Plus Pauvre》）的命运。

圣西门在《日内瓦信札》中就已经提出“一切人都应当劳动”的原理。他在这同一部著作中已经指出，法国的恐怖统治是贫穷群众的统治。“看吧——他向贫穷群众高声说道，——当你们的同志们在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就了饥荒！”但是，了解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贫穷民众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一八〇二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一八一六年，圣西门宣布说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说政治将要完全为经济所包括。虽然这里认为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基础的见解还只表现为萌芽状态，然而认为对人的政治管理应当变成对事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即应当导致最近纷纷谈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却已是完全明白地说出来了。圣西门以同样优越于其同时代人的精神，在一八一四年间——在联军进入巴黎以后不久的时候，——尔后又在—一八一五年间（在百日战争时）声明说，法国和英国的同盟以及这两国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和平发展和繁荣的唯一保证。确实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历史远见能力，才敢在